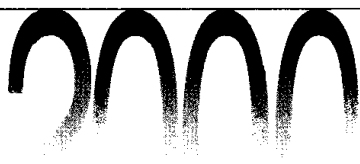


27

SHANGHAI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

上海百年文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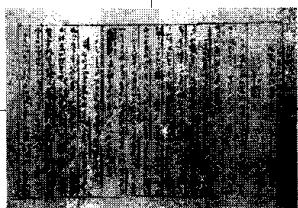


第二卷
下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K285.1
S31C
4

第二卷(下)



上海百年文化的门类演进

上海全部解放

第十七章

新闻的百年纵横

我軍攻克吳淞要塞
市區殘敵四出投降
宋軍撰

- 近代报刊发展的新高潮
-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 三十年代的盛衰
- 抗战胜利后的重建
- 人民的新闻事业
- 一九五六年的新闻改革
- “左倾”影响下的曲折
- 十年动乱的重灾区
- 进入新时期
- 九十年代的新发展

低金圓券流通限期

切計應以人民幣為本位

上海學聯正式成立

保障全體人民健康社會安寧

上海軍管會奉命成立



一 近代报刊发展的新高潮

(一) 戊戌维新推进报业近代化进程

上海早期近代报刊几乎都是外国人兴办起来的。这是因为近代新闻事业及报纸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国长期处在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缺乏近代报刊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后，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上海与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滋生发展，一些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上海移栽西方新闻纸，兴办报刊，自19世纪70年代初《申报》创刊以后的20多年间，《申报》、《新闻报》和《字林沪报》形成三报鼎立之势，独占了上

第 一 日 十 三 月 四 英	申報	日 三 十 二 月 三 申 壬	大 清 同 治
本館告白 今天下可傳之事甚多矣而淫沒不彰者其故何耶蓋好事者為之記載述便奇聞逸事則然無稱殊可嘆惜也溯自古今以來史記百家載籍博山經地志記述甚詳然所載皆前代之遺聞已往之故事且屬翰墨繁文辭高古非庸科先生不能有也非文人學士不能觀也至於傳言小說代有傳言若張華志博物十寶記抄圖寶譜為志怪之書或初為之筆之題凡諸類均可流傳雖其事或荒誕無稽其文皆典雅有則楚僅能助儒者之清談未幾為俗所共賞求其紀述當今時事文詞實而不便事則且能詳上而學士大夫下及農工商賈皆一讀之興矣新聞紙之創始自西人傳於中土與見香港星字新聞紙者至今仿其意數申報於上海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與與夫一切可驚可喜之事足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讀務求其與我無妄使觀者明白易曉不為浮誇之辭不為荒唐之語庶幾留心時務者於此可以得其梗而出野生埋者於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聞之作固大有益於天下也且夫天下至廣也其事亦至繁也無其人又設不能相見也夫雖能周覽而周知哉自新聞紙出而凡可傳之事無不遍傳於天下矣自新聞紙出世之覽者亦皆不出戶庭而知天下矣豈不善哉惟是事雖興與若初創或恐閱於方隅限於知識遙隔滋多向希四方君子進而觀之匡其不逮實有厚望焉申報主人謹白 本館條例 啟者新聞紙之設原欲以開新智廣閱覽義德四方者也使不事巡搜博採以撰我見聞復何有源流雖觀以傳其新異是不可徒拘拘于一鄉一邑也茲本館特將條例開列于左如 貴客賜顧或蒙賜顧者新惠顧一切為幸 一本新報定價于上海各店零售每張取錢八文各處遠近發賣每張取錢十文本館通賣每張取錢六文 一如有騷人誦士有願以短什長篇題教者如天下各名區竹枝詞及長歌紀事之類概不取值 一如有名章謠詞實有係乎國計民生地利水運之類者上關 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附登新報概不取酬			

《申報》创刊号



海的报刊市场。真正由中国人自己兴办近代报刊,发展新闻事业是在戊戌维新时期。

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有重要地位,它在思想文化上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社会的政治思想结构上引发了现代社会团体的建立和组织活动。这些都为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兴办报刊提供了条件。因而出现了第一次中国人自办报刊高潮。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的维新志士,感到甲午战败,中国进一步丧权辱国,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期望通过舆论手段呼唤维新变法,奋发自强以挽救中国。另一方面,光绪皇帝“明定国是”的上谕中“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这对维新分子是莫大鼓舞。因此,全国不少城市纷纷办报,三四年间,由维新派直接或间接创办的报刊达70余家。上海是维新运动兴起的舆论中心之一,新办的报刊也最多。其中有议论时政的《强学报》、《时务报》、《时务日报》;有“务期利兴弊除,庶贫能富,弱能为强”鼓吹强国富民的《富强报》;有“讲求学问,考核名实为主义”的《实学报》;有“天下变故,非复常理,鉴于古不若鉴于今,鉴于史不若鉴于报”的《求是报》;有唐才常、章太炎参加编辑、猛烈抨击清政府腐败统治的《亚东时报》;有报道时事,兼刊上谕,中西要事的《格致益闻汇报》、《亚洲时事汇报》;有提倡女学,争取女权,启蒙妇女解放的《女学报》;有开民智、广见闻,译东西洋切要书籍、报章的《译书公会报》;还有采集中外各报精粹的文摘性的《集成报》等等。在繁多新颖的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带有政党色彩的政治报纸,如康有为、梁启超创办《时务报》。维新志士创办报刊,还标志着文人论政,政治活动家开始登上报坛。

《时务报》1896年8月创刊,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撰述(总主笔),报纸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把报纸作为国家和民众“去塞求通”的耳目和喉舌。开始以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要求改变上下内外壅塞不通的状况,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以求中国转弱为



强。发刊后,梁启超所写的政论文章达 60 篇,占报纸全部政论的一半。他的《变法通议》是表达维新派观点的纲领性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趋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他的这种大声疾呼,对维新思潮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热情洋溢,气势磅礴。当时的“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时务报》也随梁启超的政论名噪一时,连湖北等省大小衙门都按期购阅,发行最多时达 1.7 万余份,为中国近代报纸产生以来所未有。

《时务报》的风行,除了梁启超的政论影响之外,同时还有报译和副刊。《时务报》的报译,与当时一般报纸所载的动态性或猎奇性报译不一样,而是按康有为提出的“广译五洲近事,译录各省事政,博收交涉要务,俾阅者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以开民智而雪国耻”的方针办的。如国外对中国事务的议论:《论东方时势》、《美国领事论中国厘金弊病》等,这些有针对性的议论,弥补了自己政论中暂时不宜公开议论的不足。副刊刊登英国柯南道尔的《滑震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这种具有科学逻辑性带推理性的西方文学作品,对当时中国读者说来,也是从来未有过的一种启蒙。

《时务报》之所以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主要是甲午战败,中国又一次面临列强瓜分、民族危难之时,作为维新派的机关报奏响了变革图存的时代最强音,它以激烈的言词和急切的态度告诉人民非变法不可,不变就会被淘汰的道理。这就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变法图存的必要和迫切性,大大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是,随着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归于失败。之后,清廷查禁报馆,严拿主笔,维新报刊的发展趋于低潮,《时务报》也在改官报声中停刊。但维新报刊,对近代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对于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二）民主革命报刊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高涨起来。一大批知名社团人士把爱国热情与民主革命结合起来，他们著书立说，兴办报刊，为鼓吹革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吴稚晖、章士钊、章炳麟、蔡元培、柳亚子、刘师培等就是知识分子中的著名人物。上海《苏报》、《大陆》、《民国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一大批革命报刊创办起来。其中《苏报》的影响很大，《苏报》案的发生又大大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热情。

《苏报》原为清朝落职官吏陈范创办。1902年，蔡元培属下中国教育会设立的上海爱国学社与《苏报》合作，由学社师生为报纸撰写论说，并聘请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报纸的革命色彩趋于显明。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出版，章炳麟（即太炎）写了序言，《苏报》作了大量宣传，使该书多次再版，销售量达到100万册，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所未见。1903年6月，《苏报》发表章炳麟《康有为与党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系统地批判了康有为君主立宪的保皇派观点。因文章中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触怒清廷。两江总督派出南京候补道俞明震会同上海道台袁树勋向上海租界当局提出控告，章炳麟被捕，邹容不愿让章炳麟一人受株连而自动投案。章炳麟、邹容大义凛然，在法庭上与清廷官吏进行了坚决斗争，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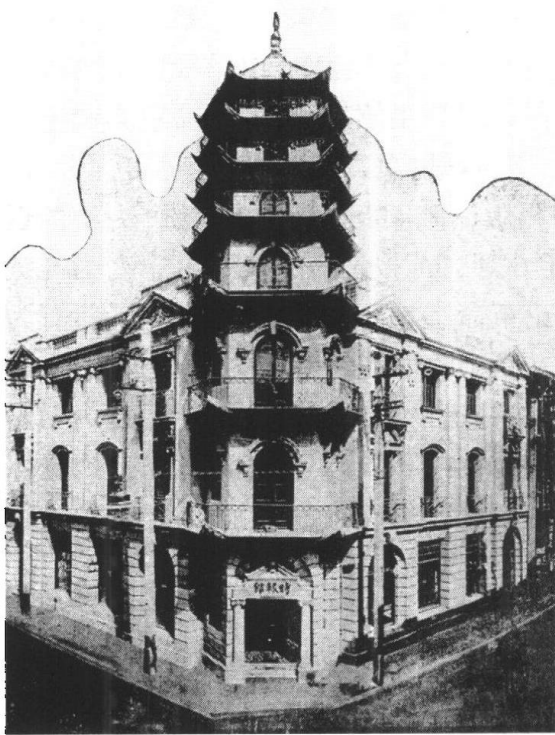
清政府在当时的上海制造《苏报》案，原想遏止革命报刊的舆论传播，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但是，事与愿违，由于《苏报》的影响，反而使革命报刊活动更加活跃。《苏报》被封后，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张继、刘师培、陈独秀参加编辑。为避免清政府的干



预,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章士钊吸取《苏报》教训,革命的言论稍有缓和,着重揭露清政府的黑暗腐败。1903年2月《俄事警闻》创刊,1904年2月更名为《警钟日报》,由蔡元培主编,陈去病、柳亚子等参加编辑。4月26日报道了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的消息,第一次公布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的革命纲领,1905年又遭清廷通过租界当局查封。当时的民主革命报纸被查封之后,往往改头换面,继续出版,接着又被查封,好些革命的报刊就是在这样变幻曲折的情况下坚持下来的。

1905年11月,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革命派在组织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把原来在国外的革命舆论

工作转向国内,上海就创刊了十多种报纸。如《神州日报》、《中国女报》、《天铎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光复报》等。《民呼日报》有显明的反清反帝倾向,于1909年5月创刊。因报馆代收陕甘赈款,上海道蔡乃煌诬以侵吞,着租界会审公堂拘究。于右任被关押40多天,查无实据,被驱逐出租界,报馆被封。于右任出走日本后未久返沪,继续创办了《民吁日报》,其宗旨与



1904年创刊的《时报》馆



《民呼日报》相同。其所以称为“民吁”，只是“呼”字少了两点，意思是民众“呼”都不能，只好“吁叹”了。10月间，报纸连载社论《论中国之危机》，又刊登《锦齐铁道与远东和平》，对日本侵华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为此受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要挟，只刊行了47天就遭到了封闭。1909年10月，于右任继续创办《民立报》。这次，吸取了前两报被封的教训，办报宗旨含蓄地说成是为了“唤起国民责任心”。次年，宋教仁由日返沪，担任主笔，恢复了浓厚的革命色彩，报馆成为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一个重要联络机关。“民呼”、“民吁”、“民立”，三报一人主持，相继而行，人称“竖三民”。

在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兴起之际，一些商办报纸也有进步。1905年《申报》进行了改革，并改变了黄协坝主持期间的“批康批梁”态度。虽对资产阶级革命并未有明显赞成的态度，但加强了对清朝腐败统治的揭露。

20世纪初，文艺、科技、教育等方面专业性的报纸迅速增加，这标志着上海新闻事业发展开始多元化。其中以文艺方面为最



《游戏报》



多。著名的文艺报人李伯元先后创办的《指南报》、《游戏报》、《同文消闲报》和《世界繁华报》，对全国文艺报纸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李伯元、吴趼人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讽刺小说就连续刊登在这些报刊上。

（三）辛亥革命后政党报刊的分化和挫折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为遭受清政府严厉压制的新闻事业带来了生机。从武昌起义到民国成立，上海一地的新办报刊不下数十种，是除了北京之外在全国兴办报刊最多的城市。当时的报馆大多集中在望平街一带（今汉口路、九江路），每当报纸出版时间，人们争向到这里阅报，在贴报栏前议论共和国大事，成为传颂一时的“共和声”。

20 世纪初期，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新闻事业中心。1905 年，上海日报公会成立，1910 年，全国报界俱进会成立于上海。上海也是革命党人进行报刊活动的重要城市，为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推动武昌起义起了很大作用。

随着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分裂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分化，民国初年，一些资产阶级政党报刊迅速走向反面，尤其是趁共和政体初建之机新成立的政党报纸，为了自己一党一派在政府和议会中多觅一点权力，互相敌视，互相攻讦。甚至互揭老底，互骂为“贼党”、“贼报”，因之威信扫地，为人们所唾弃。

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报律没有颁布之前，定有《暂行报律》三章，令报界共同遵守，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新生共和国的安全。但《暂行报律》公布后，代表各报的中国报界俱进会表示反对：“报界全体万难承认”。章太炎还在《大共和日报》发表社论指责内务部，说它是“南京已辞职之内务部”。这不仅是不承认内务部，实际上是不承认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大共和日报》不承认南京临时政



府内务部,既反映了当时报界的错误立场,也反映了当时新闻界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立报》,虽然站在拥护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立场上,但它的政治路线已转向南北妥协,在舆论上强调“不要逼袁世凯为恶”,以妥协求团结,使报纸的革命性变得相当薄弱。革命派中还有称之为“横三民”的报纸,这就是戴天仇主办的《民权报》、吕志伊主办的《国民新闻》和邓家彦主办的《中华民报》。他们与《民立报》公开争论,对袁世凯持批评态度。但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迷信于议会斗争和政党政治,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所以这些报刊没有统一的革命纲领,在反袁斗争上的作用也有限。到1913年7月,国民党人“湖口起事”(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之后,原革命派中许多重要人物流亡国外,袁世凯也在国内加紧了压迫,《民立报》被迫停刊。至此,上海原属同盟会系统的报刊非禁即闭,几乎摧残殆尽。全国情况也大致如此,史称:“癸丑报灾”。

1915~1916年间,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先后又创办了《爱国晚报》、《民信日报》、《民意报》、《中华新报》和《民国日报》等,对袁世凯称帝大加挞伐。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日渐暴露,新闻界的反袁队伍也不断扩大。《申报》原来认为推翻了清朝统治,由袁世凯当总统是“以暴易暴”。在史量才独资经营后,摆脱了立宪派张謇、应德閔的控制,抵制了袁世凯的收买。1915年9月在该报一版头条刊出《本馆启事》,揭露筹安会复辟帝制的阴谋,进一步表明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立场。1916年6月,袁世凯的“皇帝梦”破产。黎元洪下令废止《报纸条例》,7月初,前被查禁的上海《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五七报》、《公论报》、《甲寅》杂志、《正谊》杂志、《爱国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中华白话报》、《中华革新报》、《时事新报》、《共和日报》、《民意报》等报刊通令解禁。接着,法驻沪总领事释放了前《爱国日报》总经理徐建侯,同时出狱的还有瞿钧、



梁钟汉、戴仁生等,新闻业开始复苏。

二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 新闻业务的革新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传播事业的发展和新闻业务的改革起了促进作用。1912年8月,由李卓民等联合创办民国第一通讯社。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它每日一次或两、三次向上海和全国各地编发新闻通讯稿。同新闻报刊一样,上海最早的通讯社也是由外国人办的。早在19世纪70年代,上海、香港与欧洲之间接通了电报,英国路透社在上海组建了远东分社,向《字林西报》等外文报纸发稿,中文报纸获得路透社的讯息,是间接地从外报转译摘取的。民国第一通讯社的建立,突破了外国人对通讯社的垄断。以后十余年间,上海又有中国人创办的5家通讯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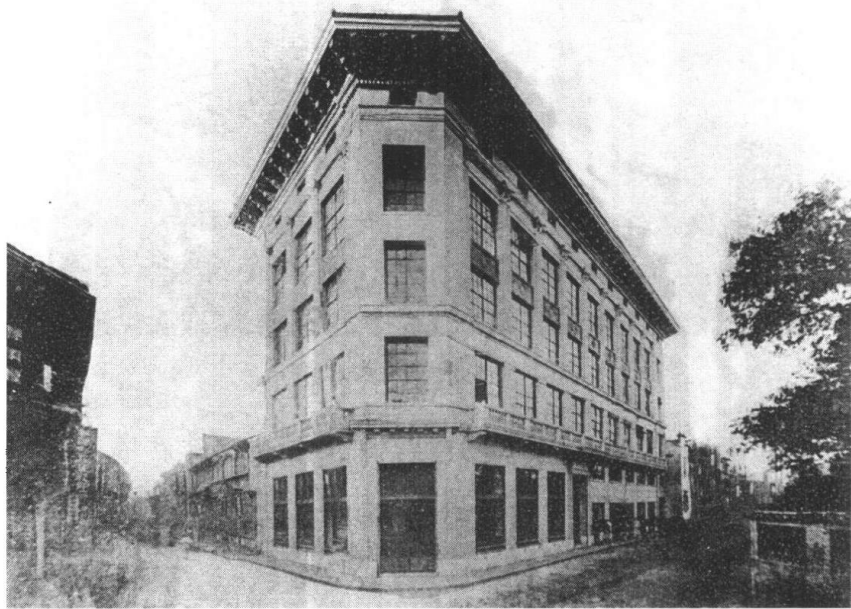
原来以政论为主要内容的政党报纸开始向新闻方面转化。原来就注重新闻报道的《申报》、《新闻报》,这时也加强了新闻传播活动。著名的新闻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等被聘为申、新两报的特约记者,常驻北京,拍发电报,撰写通讯,受到读者的好评。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报开始了改革副刊的竞争。《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扩版,改为日刊,同时又增设《星期增刊泼克》,这是上海报纸有漫画副刊的开始。《民国日报》也取消了原有副刊《民国闲话》、《民国小说》,改出《觉悟》,成了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新申报》也改《自由新语》为《小申报》;《时报》则推出全国第一种专业性副刊《教育周刊》,以后又陆续添出《妇女周刊》、《文艺周刊》、《实业周刊》、《医药周刊》、《英文周刊》、《美术周刊》等7种,成为全国首家一周内7种副刊每日轮刊的报纸。

进入20世纪20年代,《申报》开始了业务上迅速发展的时



期。1922年纪念创刊50周年,并由黄炎培主持编辑出版《最近之五十年》纪念册,约请名流学者梁启超、蔡元培、孙中山、李大钊、胡适、章炳麟,马寅初等写文章,论述50年来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其中,对世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劳工运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精辟的论述,不失为思潮迭起,百家争鸣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新闻文化学术年鉴。这时候,报纸的销数与广告,已有很大增长,业务上也加强了经济新闻与教育新闻,出版各种专刊,1924年创办本埠增刊。1925年7月,与《时事新报》联合创办申时通讯社。

这一时期,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发展,报业资本也有所增长,主要是《申报》和《新闻报》,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积极扩大资本的投入。《申报》在1918年兴建了当时国内唯一的设备完善的报业大楼。与此同时,向美国订购的最新式印报机



申报馆新厦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行量最高的《新闻报》



申时通讯社记者外出采访

投入运行,每小时可印报 3 万份。《新闻报》也兴建新楼,添购高速轮转机印报,实现印刷现代化。1929 年,新闻报由外商手中转归国人经营,而百分之六十的股权为史量才所购买,几乎造成了申、新两报合为一家,组成报业托拉斯的局面。后来因受到多方制肘、干预,史量才的托拉斯计划没有实现。之后,上海英文《大陆报》由外

商之手转归张竹平经营，张原已兼有《时事新报》和申时通讯社，1932年又创办了《大晚报》，组成了“四社办事处”联合经营。这些都反映了上海报业向垄断发展的趋向。

海派小报的兴盛，也是报纸多元化和新闻业务改进的一个特色。1919年趋于衰败的《神州日报》发刊《晶报》三日刊。之后各种海派小报相继出版，同类型的有《小日报》、《金刚钻》、《海报》、《大报》等。到1926年，与《晶报》、《金刚钻》同称海派小报“四大金刚”的《福尔摩斯》、《罗宾汉》等先后出版。1926~1927年，发展到三四十种。

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事业，也在一些大学文科设立新闻学(报学)系科的基础上，向建立新闻专科学校发展。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报学系，由美籍教授卜惠廉提议设立。这是中国最先设立的大学新闻专业。1928年冬天，顾执中创办了上海民治新闻学院，1932年改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初期有教授严独鹤、戈公振等，分正、预两科，内设编辑、采访、报业管理三个系，并设有日班和夜班，便于业余学习。这所专业新闻院校，是在旧中国办得最久的新闻院校。1929年9月，上海复旦大学正式成立新闻系，谢六逸任系主任，先后聘请的教授有戈公振、陈布雷、黄天鹏、柯炳勋、



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



周孝庵、潘公弼等人。学制为四年,实行学分制。该系还创办有复旦通讯社、《复旦五日刊》,供学生实习之用。

(二) 新型报刊的诞生和发展

五四运动开创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新闻舆论也在新思想指引下向前发展。随着运动的中心由北京向上海转移,上海成了新型报刊的出版中心。这些报刊中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进步报刊,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筹建时和建党后由一些先进分子和领导人创办的。他们运用自己的舆论工具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在新型的报刊中,《新青年》是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它原为上海的《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与李大钊合作创办,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次年,陈独秀应蔡元培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度迁往北京(仍在上海发行),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1918年11月,《新青年》5卷5号发表了李大钊宣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的胜利》长篇论文,热情洋溢地宣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篇文章与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北大师生、北京群众集会上的讲演词一起刊登,引起了广泛的影响。1919年6月李大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新青年》迁返上海后,7卷1号上发表《本志宣言》,以后又出版劳动节专号,表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在党的筹建过程中,陈独秀亲自主持《新青年》,与基尔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新青年》从一家以民主主义冲破封建思想牢笼的学术文化杂志,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筹建组织机关报刊。当时,还有1920年11月创刊的《共产党》月刊。它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未来革命的道路,